

歲月

参事馆员见证 改革岁月

参 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参事馆员见证 改革岁月

参 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参事馆员见证改革岁月 / 参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01-020286-0

I. ①参… II. ①参… III. ①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①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0003 号

参事馆员见证改革岁月

CANSHIGUANYUAN JIANZHENG GAIGE SUIYUE

参 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20286-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在历史的重大抉择面前，中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荆棘满地的改革开放之途。这条路，不是哪一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多次反复酝酿，“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自古至今的改革，莫不是关隘重重、风浪险恶。40年前的冬天，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契约书上按下“红手印”，冒死实行土地大包干。而在深圳建立首个经济特区，则必须要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信念与勇猛，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济世情怀。

回望当年，那段激情澎湃的改革岁月，一个个、一批批改革者以敢闯敢试、自我革新、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智慧，担当起了中国蜕变与崛起的时代重任。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拥护者、践行者、推动者、奉献者——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们，既是见证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资料库、档案馆，也是改革再出发的思想库、智囊团。

站在历史的新征程上，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坚定行动，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目 录

1 前 言

1	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何星亮
13	中华文明的革新精神	袁行霈
18	《实践》数易其稿终出炉	谢武申
29	思想争鸣在特区	邓伟志
39	安徽农村改革侧记	赵德润
47	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探索	杜 鹰
57	“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	刘志仁口述 吴睿娜撰写
68	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陈平原
77	我参与邓小平视察南方报道	张胜友
87	南方谈话精神的台前幕后	吴松营
100	我主持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	周瑞金
116	民营经济的禁区是怎样突破的	陈全生等

129	推动高考的改革	张厚粲口述 吴睿娜撰写
137	时代造就新青年	郝杰英
145	中西合璧的教育梦	杨福家口述 吴睿娜撰写
155	我对土地批租的建言	杨小佛口述 朱玖琳撰写
160	海外游子的中国心	瞿世镜口述 吴睿娜撰写
170	从深圳经济特区到粤港澳大湾区	王京生等
184	从缩小差距到乡村振兴	仇保兴等
195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 第一动力”	张洪涛等
205	文以化人的力量	王蒙等
214	引领性参与国际组织	章新胜
220	扶贫开发回看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汤 敏
230	专家学者寄语新时代 邓小南 蔡望怀 陶思炎 谢维和 王东进 刘 奇 张红武 何茂春 胡本钢 邓小虹	
243	后 记	

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何星亮

| 作者简介 |

何星亮 男，1956年生，广东梅州兴宁人，国务院参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2006年起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改革活动。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人口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改革涉及内容之多、效果之大、影响之广，也是世所罕见的。40 年的改革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使中国进入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中外历史上任何变法或改革都无法与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相媲美。值此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观念转换·思想解放·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笔者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观念转换、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表层）、制度层面（中层）和观念层面（深层）。观念层面的文化包括思想、精神、意识、理念、理论、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它是社会和文化形成、发展和变

迁的基础。观念层面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变化。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16世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它打破了天主教神学的精神束缚，更新了宗教观念，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

从中外历史来看，任何成功的改革或变革总是首先在观念层面进行更新和转换，只有通过宣传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论，更新人们的观念，解放人们的思想，并在社会各阶层取得广泛共识，才有可能使改革顺利并取得成功。如果舆论宣传不够，没有在思想观念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将会阻力重重并难以取得成功。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通过辩论，在思想意识上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主持下秦国进行变法大讨论，商鞅舌战群臣、说服群臣并达成共识，为实行变法作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和思想准备。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匆忙进行制度层面的重大改革。戊戌变法也一样，仅依靠光绪皇帝一人之力，不重视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的转变，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匆忙推出新政，结果也失败了。

1978年，我国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新征程，也是始于观念的转换更新和思想大解放。《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思想转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如果现在再

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观念转换和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推动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中国“富起来”的新时代。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也是基于观念转换、思想先行和理论创新并举。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以物质生产为核心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片面强调物质生产，导致产量第一、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采用拼体力、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产能过剩等非科学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但贫富差距扩大；贪官成群，腐败成风；社会安全、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房价越来越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一系列深化和完善改革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理念。在发展方式上由主要重视经济建设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在发展理念上由主要重视GDP转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治国理政基本目标上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倡互利共赢、开放包

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由“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一定能够实现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观念转换、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也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观念比喻为“总开关”。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

——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

以民为本，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孔子家语·五仪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把百姓和君王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孟子·尽心章句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指出了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的先后、轻重次序关系。《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认为上天生育民众，不是为了君主。而上天设立君主，正是为了民众。《管子·霸言》：“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民为根本。根本治理得好则国家巩固，根本被搞乱了则国家危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弘扬历史上的优秀治国思想，以民为本，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坚持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邓小平更是从关心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情”，看成是党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40年来，党和政府深怀爱民之心，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恪守为民之责，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善谋富民之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需要。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的研究：“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4年的75岁。”

笔者认为，顺从民意，根据人民大众的意愿进行改革，也是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的幸福、安全、健康等为根本，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他在 2016 年 4 月 18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时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正民心”也是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传统文化以培养善良、老实、本分、厚道的人为基本目的。注重教化，重心性修养，通过压抑私欲来规范行为；通过教化、修养来提升人的自律意识；重树立典型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典型人物的意识和行为约束自己。通过教化使每一个人都有“良心”，都有廉耻感，使每一个百姓都成为讲仁义、重诚信、崇道德、尚智慧、敬廉洁、守法规的中国人。辜鸿铭曾说，在中国，“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建设不同步，再加上外来各种不良思想的冲击，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等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失去功能，造成价值错乱，道德失范。部分人利欲熏心，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中国 GDP 成为全球第二震撼了世界，但“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也同样震撼世界。许多官员以权谋私，关系至上，金钱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横扫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既是古代中国的治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因素，同时也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因素。

循序渐进·由点到面·上下联动

——改革开放成功的保障

从中外历史上的改革方式来看，可分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两类。大多数情况下，渐进式改革成功率较高，如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之一是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式。变法分三步：首先在物质生产层面进行改革，公元前359年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

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等。其次是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在《垦草令》实施3年后，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非王族大臣领政），在法律制度、世卿世禄制和家庭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最后，在公元前350年，再次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一是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二是普遍推行县制；三是统一度量衡制；四是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商鞅变法的顺利进行，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激进式改革成功率较低，尤其是大国，成功率更低。如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都属于激进式改革，短期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结果都没有成功。俄罗斯1992年的“休克疗法”改革也一样，推出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由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副总理盖达尔不得不于1994年1月16日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并在1996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

40年前，我国采取的改革方式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和上下联动相结合渐进式改革方式，先易后难，先行先试，逐步推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有人称之为“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区域差异大，如果采用激进式改革，有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象

到本质、由直观到抽象的循“序”过程。采用渐进式改革，可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以解决吃饭问题。然后逐步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沿海到内地进行渐进式改革。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由点到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实行某种决策之前，往往先搞试点，先做试验，验证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科学，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面，扩大到全省或全国。改革开放也一样，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农业改革还是工业改革都是如此。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该责任书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发展迅速。1979年10月，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全国推广。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

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 7% 的土地养活世界上 22% 的人口的奇迹。

“上下联动”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之一。无论任何改革，如果只有领导层面的主观意志，而没有群众层面的主动配合，不可能达到目的。同样，如果只有群众层面的主观意志，得不到领导层面的支持也不会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由下至上、上下联动的基础上获得成功的，这在当时是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的行为。当时如果没有获得万里等地方领导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经济特区也一样，先搞试点，上下联动，先由基层提出建议，然后获得中央的大力支持。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成长于 90 年代。1979 年 4 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3 月，广东有关部门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获得中央的批准，并首先在深圳实施。经济特区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迄今为止，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霍尔果斯、喀什 7 大综合性经济特区外，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先后建立的 54 个国家级高新区、15 个保税区、62 个出口加工区、9 个保税物流园区、13 个保税港区和 9 个综合保税区都具有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较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2013 年栗战书在《遵循“四个坚持”的改革经验》一文中对“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和由点到面等改革方式作了全面的解释。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脚踏实地、尊重实践、从实践中摸经